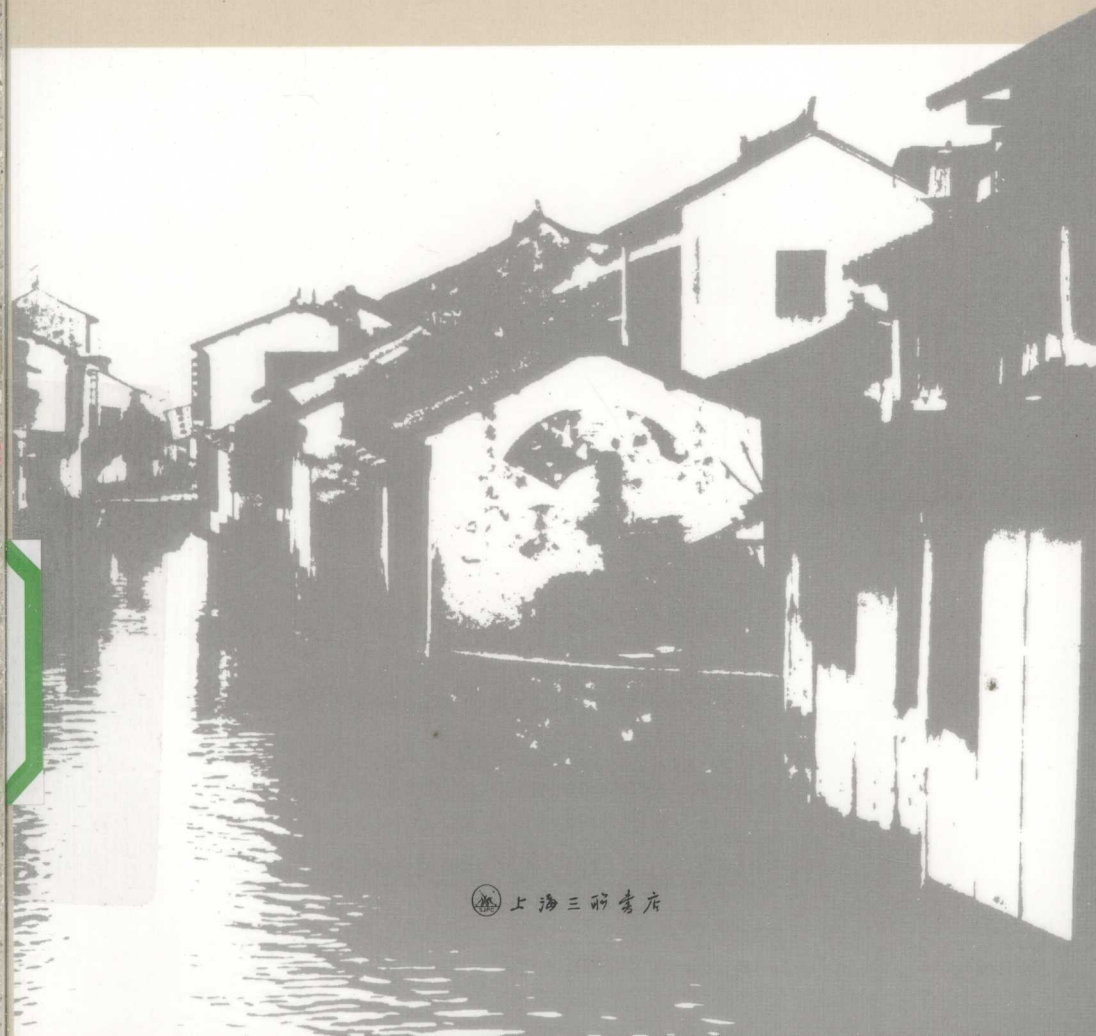


民俗学 与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张永著



上海三联书店

民俗学 与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张 永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张永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1

ISBN 978 - 7 - 5426 - 3138 - 1

I. 民… II. 张… III. 民俗学—关系—乡土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109 号

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著 者 / 张 永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0.875

ISBN 978 - 7 - 5426 - 3138 - 1/I · 442

定价:28.00 元

序

王保生

张永教授寄来厚厚的一摞书稿：《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邀我写一篇序，他是我的好朋友许志英教授的博士生，老许驾鹤西去已经三年，他生前曾多次兴奋地与我交谈他的那批弟子们的学业情况，老许说，他是认真的，一定要让他们把论文打磨到他满意的程度，才会向有关单位推荐。因此为张永的专著写点什么，我感到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的是向青年学人学习，也为了寄托一点对老友的思念。

· 在我的印象中，张永似乎一直在读书，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紧接着又在南京师范大学和扬州大学读了两个博士后，在这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时代环境中，这种耐得住寂寞，经得住利禄诱惑的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张永孜孜不倦的努力，就等一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本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专著。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轫于上世纪初，鲁迅是最早的开拓者，也是成绩最为卓著者。人们惊奇地发现，鲁迅的创作甫一开篇，就登上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高峰，《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在鲁迅的影响下，20到30年代，一批乡土小说家奉献了他们的精品力作。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对这阶段乡土小说的勃兴和思想艺术成就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应该说，在这样的研究成果面前，想要有所超越，有所创新，是比较困难的。张永教授知难而进，选取民俗学这一新的视角，

对这一阶段的乡土小说进行了新闻释,别开生面,推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向前的进展。

民俗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有它的专门的知识谱系,看得出来,张永教授是为此下过很多功夫的,他比较系统地吸纳了当今世界的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对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别和归纳,特别是他有十多年现代文学、尤其是其中现代乡土小说的系统研读经历,有较为丰厚的相关知识积累,两者结合,优势互补,就能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令人欣喜的成绩。这是那些缺乏扎实根底的凌空蹈虚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部专著首先在学风的踏实、严谨,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上,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许。

我们经常讲,五四新文学是活文学,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真实的反映,是一种生气流动、活泼的文学。它之所以能在上世纪初取代几千年的封建旧文学,就是因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学是一种僵死的卫道文学,它与现实完全脱节,与人民生活完全脱节,也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五四新文学战胜封建旧文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能独领一个时代的风骚。只是到了后期,由于僵化,由于脱离社会生活,脱离人民,它们才为新兴的与当时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文体所取代。张永在书中,紧紧地从民俗学的角度,很有见地论证了五四新文学取代封建旧文学的历史必然性。五四新文学高张人的文学的旗帜,在思想观念,在文学语言,在体式架构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格局。张永在专著中指出,人的文学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表现社会生活的人,表现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从人的具体生活方式中来塑造活生生的人,这就凸显了民俗描写在现代乡土小说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封建的皇权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在广大的市镇和乡村

中,民俗也与这些统治思想一样,牢固地存在着,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我们看到现代乡土小说中关于“沉潭”、“冥婚”一类令人发指的描写,以及更多的与愚昧迷信相联系的陈规陋习,但又看到蓬勃着生气的节庆礼仪,旧历新年放鞭炮,舞龙舞狮,端午节的划龙舟,中秋节的阖家团聚,又是那么欢腾热闹,那么令人神往。即使是日常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也都有种种规矩、种种“礼数”,蕴含着浓浓的乡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现代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民俗中阴森可怖的一面,同时又看到温情诗意的另一面。在乡土小说中,有时侧重描写前一方面,有时侧重表现后一方面,但也有作家能把这矛盾的两个方面组织在一篇小说里,如沈从文的《萧萧》,当萧萧这个童养媳被骗失身后,照规矩就面临着“沉潭”或“发买”的悲惨命运,可是因为她生了个男孩,又是被夫家收留下来,照样与丈夫拜堂成亲,当她抱着第二个儿子在房前乘凉时,第一个孩子娶的童养媳又吹吹打打地迎进了门。日子又在悠悠地过去,一切皆有“规矩”,一切皆自然,民俗的凶残与温情就这样谐和地交织在一起。它说明民俗是一种历史的积存,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水平相联系的,在旧中国不发达的城乡经济中,它也成了一种超稳定的存在,成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一种存在方式,民俗就是生活本身,它与农村生活的全部已经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民俗不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农村生活内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外在形貌上呈现,而且还内在地形成一种农民的思维方式 and 思维习惯。书写农村,刻画农民,不熟悉农村的生存方式,不熟悉乡风民俗,就无法了解农村,无法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中国现代文学史表明,只有那些对乡村生活的全部抱着一种情真意切感情的作家,才能写出让人难忘的乡土作品来。

张永的专著中还反复强调,民俗描写、民俗呈现对乡土小说创作极为重要,但乡土小说毕竟不是民俗学报告,民俗的表现是为小说气氛的营造,为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服务的,鲁迅的

《祝福》、《故乡》、《在酒楼上》，我们看到的是江南水乡凄清冷落的风光，和各式饱经磨难人物的身影。民俗的展示已内化为情节，内化为人的感情，内化为人物的思维方式，它与故事和人物已经血肉一体，调动起读者的五官，使你在小说中听到、看到、体味到乡村生活的苦和甜、喜和悲、血腥和诗情。民俗描写已经成为乡土小说诗学深度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对当代乡土小说创作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张永的研究是实事求是的，他只是把民俗学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并不想无限夸大自己研究课题的意义。与其他研究方法或审视角度一样，它只是现代文学多元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不能否定或代替其他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优长。而且就民俗学研究角度本身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种对学科的清醒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回望当今的一些小说创作，似乎只有滔滔不绝的作者的叙述，或者是没完没了的人物对话，没有景物描写，也没有地方色彩的显示，光秃秃，干巴巴，缺乏诗情，也缺乏化入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描写，作者们没有抓住变动不居的乡土生活的魂，体味不到新时期乡土生活新的神韵和诗情，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张永对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就有着更为切近的现实意义。

2009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目 录

序	王保生
---------	-----

第一章 民俗学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1
一、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发展概观	1
二、中国现代民俗学对文学的倚重	5
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作家构成	11
四、民俗学传播的文学及非文学刊物	17
五、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架构	21
第二章 为人生派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	26
第一节 鲁迅民俗取向对乡土作家的规制	26
一、反正统：鲁迅民俗取向的文化批判性格	26
二、鲁迅乡土小说的民俗学阐释	37
第二节 为人生派乡土小说的民俗构成	43
一、血缘：宗法制度下奇异的婚姻习俗	43
二、地缘：乡土世界复杂的信仰民俗	64
三、乡土性：乡村社会复杂的民俗观念	93
第三节 妈祖原型与许地山乡土小说	106

第三章 “左翼”乡土小说的民俗学内涵	124
第一节 茅盾批评与创作中的民俗学意识	124
第二节 左翼乡土小说多元民俗风貌	137
一、民间精神与王统照乡土小说	137
二、江南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构成	144
三、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	172
四、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197
第四章 京派乡土小说的民俗审美特质	221
第一节 周作人民俗趣味与京派审美选择	221
一、趣味：周作人民俗审美心态	221
二、周作人民俗趣味与京派创作	225
三、周作人民俗趣味与京派批评	235
第二节 废名乡土小说民俗学内蕴	244
一、禅宗：废名小说的审美向度	244
二、意境：废名的民俗审美追求	256
第三节 沈从文乡土小说民俗审美价值	267
一、沈从文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	267
二、沈从文小说的民间意象	281
三、沈从文小说的酒神气质	316
参考文献	334
后 记	338

第一章 民俗学语境下的 中国现代文学

把民俗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民俗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存在实际关联,它们在哪些层面实现了结缘与互动,以及运用民俗学理论阐释文学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具体的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化语境与深厚的文化人类学底蕴。

一、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发展概观

中国民俗学与现代文学是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客观上存在共时互动的关系。首先,与新文学一样,民俗学的诞生体现了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五四’前后的歌谣学,就其主要的倾向而言,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在这一方面的一种体现。”^①1918年2月,蔡元培、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率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启事。蔡元培(1868—1940)支持和倡导民俗学,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有关,同时也体现出他的现代性史观。“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

^① 《“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其条流，而又综论其体系，是谓文明史”。^①当然，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大力倡导民俗学自然非同凡响。《北京大学日刊》后来成为刊载民间歌谣的阵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发表了148首歌谣。任何一门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俗学的最初情形还是较为完备的。它拥有专门的学会和刊物：1920年成立歌谣研究会，一大批文人学者开始致力于民俗学的研究；192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1923年又成立了专门的风俗调查会。从本质上说，中国民俗学和五四新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必然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新文学作家更是把审视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视为思想启蒙的核心价值取向。

其次，民俗学与现代文学具有非常相近的发展阶段，并体现出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民俗学发展的三个阶段^②几乎正对应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民俗学和新文学在西方现代性意识的影响下度过了自己的初创期；第二个“十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这个时期，民俗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得到极大的发展。首先，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民俗学在南中国蓬勃地发展起来。先后成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刊物《民间文艺》。刊物名称由早先的“民间歌谣”到“民间文艺”的变化，说明民俗学一方面突破了先前单纯的民歌搜集的狭隘套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俗学内涵得到了充实与深化，更加符合现代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要求。几乎在同一时期，钟敬文（1903—2002）与钱南扬（1899—1987）在浙江杭州创办了《民俗周

① 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② 刘铁梁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文中，把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归结为“发起阶段”（1918—1926）、“形成阶段”（1927—1937）和“缓进阶段”（1937—1949）三个历史时期，参见《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

刊》，稍后又与江绍原(1898—1983)、姜子匡(1914—)等人成立“杭州民俗学会”，开展民俗学活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如广东的揭阳，浙江的平湖、绍兴、湖州，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安徽的徽州、芜湖等地也都纷纷成立了地方性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刊物，扩大了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其次，在革命高涨、风起云涌的时代，民俗学同文学一样获取了“阶级”这一现代性意识。胡愈之(1896—1986)“民间文学”的概念初步具备平民文艺的崭新质地。^①董作宾(1895—1963)在他的《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以及《民俗周刊》发刊词里，对民众的阐释已开显政治意识形态意味。江绍原更是挑明地讲，民学(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众阶级的学问。

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是以民族救亡起头的。抗战作为国家意志成为这个特殊时代的潮流和风向标。民族意识在文学中充分彰显的同时，民俗学也自觉将其纳入学科内涵加以阐发。钟敬文指出：“民俗文化，既是阶级的，又是民族的。”^②“现代民俗学里的‘民俗’的概念，在大多数国家中，是与‘民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民众”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者的眼里则具有了“以新民族国家为蓝图的、哲学上的和理想主义的含义”^③，俨然成为“民族”的代名词。这个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在“启蒙”、“救亡”的特殊境遇中展开工作。费孝通(1910—2005)在《〈文化论〉序》^④中，谈到翻译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著作，并“不止于纯粹学术之兴趣”，而是以此观照“国民性格之倾向”。作为表达民族抗争和民族意识有效的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民俗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备受关注。闻一多(1899—1946)对民歌中“原始”、“野蛮”的酒神气质给予高度体认。

① 黄永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② 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中国民俗学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③ 董晓萍：《民族觉醒与现代化》，《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

④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重庆出版。

在《西南采风录》一书的序中,诗人引用民歌^①后这样写道:“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如今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②朱自清(1898—1948)这样评价闻一多:诗人“研究神话,……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③。民族抗争和民间精神认同成为这个时期民俗学学者和现代作家所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

当大后方学者从民间文化资源中发掘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时候,解放区文人已经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对民众所作的经典阐释成为解放区民俗学活动的重要理论前提。作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主义者则在民间文学中确认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民众思想基础——反抗斗争精神。”^④特别是毛泽东(1893—1976)在“讲话”中所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极大促进了解放区民俗学活动的开展。实事求是地讲,

① 在《西南采风录》的序中,闻一多选录了书中这样几首民谣:一、“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要驼。”(安南)二、“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三、“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四、“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五、“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六、“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诗人认同民间精神的审美倾向显然与民族抗战有关。参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93—395页。

② 《〈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95页。

③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第1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④ 吕微:《民间文学: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政治”反抗》,《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解放区的民俗学活动主要是服从服务于文艺创作,因而主要集中在对民间文艺及其形式的搜集、整理和借鉴。这既是五四民俗学传统的当下延续,也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必然要求。尤其重要的是,民间文艺显示出民众的主体性、群体性特征,同解放区民众主人翁意识、集体主义的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在特定的战争环境和现实政治的影响下,解放区作家“通过不断发挥真正的或者更为纯粹的民众话语和民间文本,并且赋予其更为抽象化和绝对化的本质,民众群体的主体地位就在象征层面得到最终的确认。”^①相比较而言,大后方民俗学活动较为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指向,而解放区则更注重民俗学的现实政治意涵。萧亨在回顾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时指出:“近代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总是同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同人民大众的群体意识密切关联。”^②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境遇赋予了民俗学和现代文学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人文学科,它们之间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是很自然的。

二、中国现代民俗学对文学的倚重

中国民俗学与现代文学的结缘与互动,源自于它们共通的审美品性,理论上存在着民俗学与文学进行交流对话的内在机制。这为现代作家借鉴民俗学学养,唤醒和激发创作的潜力,拓展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提供条件和便利。

民俗学涉及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人文学科普遍把民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当然,文学与民俗学关系是最为密切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所叙述的风土人情往往是“民”与“俗”的有机结

① 吕微:《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② 萧亨:《民俗文化在向我们招手》,《岭南民俗》1989年第2、3期合刊。

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另外,“民”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成为了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学不同,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似乎只关注风俗事象本身,而有意无意地抽取和排斥民众的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文学描写的风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再说,文学性(审美性)是民俗学属性的一个方面,特别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或许正是民俗学的审美性因素的存在,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那就是世界各国“对于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①。

当然话又说回来,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并不意味着人们民俗学的审美自觉。初期的中国民俗学也只是纯粹的民间歌谣的搜集和整理。只是到了1922年,胡适(1891—1962)在他的《北京的平民文学》中提出并强调民歌的审美价值:“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同时,文章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提出批评:“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作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② 这篇文章显然引起了周作人(1885—1967)的兴趣和注意。1923年,周作人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这么说:

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

①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 《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页。

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①

周作人提出的“学术”、“文艺”共治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意图其实并不单纯，这种提法和行文首先考虑到民俗学刊物台面的需要，似乎并不代表周作人的真实意图。由他执笔的这个“发刊词”，其根本动机还在于新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周作人在歌谣研究会“本会启事”中指出：“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二是韵文的……”^②在其他文章中周作人也一再重申：“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从文艺方面我们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③把《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研究会的《本会启事》与《歌谣》作一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如神话、童话也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立论的。周作人对待歌谣神话的审美态度，体现出他的“大文学史”观。1931年，他给江绍原《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写的序中说：“虽然歌谣故事的研究当然是应归文学史的范围，不过这该是人类学的一部之文学史罢了。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④民俗所体现出的真实的民众心理和情感，符合五四新文学真挚、诚实的

① 周作人：《〈歌谣〉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12月17日第1号。周作人认同胡适对民间歌谣的看法，“发刊词”完整辑录胡文所引卫太尔的观点，“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并且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也引述胡适的文章：“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

② 参见《歌谣》周刊1924年3月9日第64号第1版。

③ 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

④ 周作人：《〈英吉利谣俗〉序》，1931年7月。

现代性表征。胡适也意识到,“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然地产出这些活的文学”^①。把民俗学作为新文学奠基的“他山之石”,确实是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聪明用心。

“从五四以后,民歌的搜集,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初只是歌谣的采访,其态度是纯然科学的。……后渐转注到文学的领域上来。”^②这种民俗学的“文学化”倾向,既是民俗学研究者对新文学“作家”身份的一种主体确认,也与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文艺思潮有关。文学话语系统是五四新文学向传统文学发难的突破口。其实,从文学话语突破传统文学桎梏的努力与尝试在晚清就已开始。早在1903年,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小说丛话》中就敏锐地觉察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刘师培(1884—1919)在《论文杂记》里也说:“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五四新文学对白话的重视是文学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要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中心命题,是在“文学工具的革新”基础上,“建立一种‘活的文学’”。^③陈独秀(1879—1942)在《答胡适之》一文中,也竭力主张“以白话为正宗”来“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除了胡适、陈独秀等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外,郑伯奇(1895—1979)从创作题材与主题方面,认定“国民文学”应该“以国民生活为背景”,“固要研究国民生活”和“各地方之风俗”^④。罗家伦(1897—1969)从创作与传播的视角,认知“白话文是最

① 胡适:《中国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9年版,第5页。

②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胡适对白话文的倡导是积极的、一贯的。他在《白话文学史》中,从文学史理论的高度论证“一切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观点;在《中国文学复兴》里也明确提倡“要用民众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来促进新文学的产生,进而取代已经陈腐的古典文学”。

④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1923年12月23日第33号。